

天府

文化研究

【创新创造卷】

传承巴蜀文明

发展天府文化

THE RESEARCH
OF TIANFU CULTURE

主编／天府文化研究院

巴蜀书社





天府文化研究

流沙河題

THE RESEARCH
OF TIANFU CULTURE

传承巴蜀文明 发展天府文化
【创新创造卷】

主编 / 天府文化研究院

巴蜀書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天府文化研究院 主编.
—成都:巴蜀书社,2018.1
ISBN 978-7-5531-0951-0

I. ①天… II. ①天… III. ①文化发展-成都-文集
IV. ①G127.7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0551 号

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

天府文化研究院 主编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照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4mm×240mm
印张	27.75
字数	580 千
书号	ISBN 978-7-5531-0951-0
定价	9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王 笛

《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即将出版，天府文化研究院谭平院长嘱我写一个序言，我诚惶诚恐，因为本书的作者，都是研究天府文化的最优秀的学者，自感不能胜任此重任。不过，恭敬不如从命，本着老同学的热情相邀以及对研究天府文化的老师和同仁们的敬仰之心，简短概括一下我对本书所收文章和天府文化研究的一些认识和体会。

天府文化研究院于2017年10月初在成都大学成立，显示了地方政府、学界乃至社会对天府文化研究的重视和广泛兴趣。这个研究院在挂牌后不过三四个月，第一部文集便已经编定，准备出版，充分说明关于天府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机构，以及有着深厚学术基础的研究队伍。研究院一成立，便组织了“天府文化与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学术论坛，然后就是本书的编辑出版。研究院对自己中心工作的定位、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研究的课题，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划，这无疑将推动天府文化的研究。

这本《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的开篇部分，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包括舒大刚《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谭平《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水之源》，何一民《天府文化特色刍议》，潘殊闲《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王川、吴其付《天府成都古今“创新创造”名人的情感与智慧》，石硕、奚玲玲《兼



容：天府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来——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六篇文章。这些学者们认为，天府文化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因为所拥有的自然与人文资源的得天独厚，包括水利、环境、气候、物产、信仰、交通、移民以及成都城名的长期延续，可以称之为“八源”。如何对这些因素进行保护与珍惜，是建设符合新的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基本保证。学者们追溯天府文化的渊源，从秦统一巴蜀、李冰治水、文翁治蜀，到西学东渐和文化自觉。

根据学者的考察，天府文化大概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称之“前天府文化”，即秦统一之前，巴蜀在文化上相对独立，创造出三才皇、五色帝、阴阳五行、巴蜀图语等文化成果。第二阶段可以视为“中天府文化”，即从汉至清，这阶段文化融入了统一、继承、创新等因素，有“七经”“十三经”“汉赋”“史学”“古文”“宋词”“术数”“宗教”等重要成就。第三阶段可以用“后天府文化”来概括，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在文化上赋予了改革意识，包括“中体西用”“疑古”“改良”等。第四阶段可以认为是我们目前正在创造和发展的“新天府文化”，重在文化上自信，包括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礼仪重建、话语重建和经典重建等。

学者们还总结了天府文化的特色，指出“天府之国”的人文积淀非常深厚，这里孕育和汇集过许多重要人物，包括文学、政治、军事、商业等大家。他们受到天府文化的孕育，又反过来为天府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因素，为天府文化蓬勃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天府文化在传承古蜀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融合其他文化因素，形成了有自己风格与特色的地方文化，并且孕育了当地人的处世态度与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这一天府文化特色得以形成的历史源流作了长时段的梳理与探讨，并厘清了与之相关的若干概念。天府文化可以追溯到古蜀，于秦汉时期成型，鼎盛于唐宋，明清以来则有所式微，至近代以来又渐渐复兴。天府文化不仅是自然与人文、封闭与开放、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原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更是巴蜀与四川文化的精华。在成都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重点的今天，重新挖掘天府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有力增强成都的文化自信，加固成都的文化软实力，进而提升成都的文化竞争力。

还有学者对成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创新创造”贡献的名人进行了研究，以挖掘他们的情感与智慧。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不但物质财富充裕、精神生活富足，且移民文化多元、社会和谐包容，为孕育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名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这些成都的古今历史文化名人除了具有爱国爱乡、真诚坦荡、自信豪迈、乐观平和、热情浪漫的情感，更具备广纳博采、综合兼容、从容自如、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智慧。深化对这些情感与智慧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天府文化及其中的“创新创造”精神。

本书的第二个论题主要涉及天府文化的物质创造，包括陈剑《天府之国辉煌都市酒文化的考古学观察》，黄剑华《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张学君《论秦汉治蜀的两大伟绩——泽惠万代的都江堰与广都盐井》，谢元鲁《天府之国的兴衰与文化变迁——以成都与西安为例》，胡开全《壮丽以示威仪——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五篇文章。

城市作为物质文化的载体，对地域经济文化发展往往起到关键作用。学者对历史上的成都与西安在城市发展路径上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发现成都从唐代末期开始超越长安，成为重要的繁荣城市。由于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的物产丰饶，成都的城市发展有着雄厚的资源基础，包括农业、丝织业、麻织业、漆器、造纸业、出版印刷业在内的一批利用本地资源和技术的产业更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也塑造出独特的天府物质文化。城市建筑对天府文化的物质面向而言同样十分重要。

在本文集中，有的论文对成都城内的明朝十三代蜀王府进行了集中考察，发掘了其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以勤政堂为代表的政治职责、以忠孝为核心的治国理论、理学的根本性地位、以书舍实施的文教之风、以耕读轩为代表的耕读文化来夯实国家基础、以雅致小景进行性情的陶冶等众多方面。以这一系列的蜀王府建筑为载体，明代藩王藩屏帝室的责任和注重自身威仪的意志得以代代传递。作为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社会，水利工程向来是关注物质文化的学者所研究的重点。还有学者重点研究了秦汉时期巴蜀地区开发中的两大重点工程，一是李冰创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二是其穿凿的广都盐井。汉代更是扩大了都江堰的灌溉范围，开发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此外开凿了多处盐井，解决



了巴蜀地区长期存在的缺盐问题。二者为巴蜀地区其后两千余年能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此外，还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解读天府文化的物质创造因素。在成都平原的众多考古发现中，学者发现了古蜀文明与天府文化的密切联系。研究表明，天府文化的基础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传承，而治水精神是其中的重要组成因素，人文的绚丽与厚重共同构成天府文化的主要内涵，天府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则要归因于对教育的重视和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天府文化中兼容并蓄与知快守慢的个性特色。学者还把视角集中在考古遗存中与酒文化密切相关的部分，包括酿酒作坊遗址、古代酿酒生产及消费相关遗存、酒具、文字等等资料，其研究充分说明了天府之国悠久的酿酒历史与传统。成都的酒文化与城市的市井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了成都都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天府之国成都平原酒文化的独特都市定位。

天府文化的内涵除了伟大的物质创造，更包涵了历史人文的精神建构。有六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包括尹波《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的蜀中山水之意》，粟品孝《“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宋代大儒魏了翁回归元典的创新品格》，魏红翎《论四川国学院的创新性及其意义》，李勇先《试论晚清民国时期巴蜀乡土志的编纂及其创新》，陈世松《天府成都东山地区客家文化的创新演化过程》，以及邓经武《晚唐天府说成都》。

他们的研究分别关注教育与文化。如对唐代著名诗人陆游和宋代大儒魏了翁的研究，从对人物的个案考察出发，提炼出天府文化“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特质。学者还分析了清末民初的四川国学院，发现以往被视为保守派典型的四川国学院实则蕴含着创新的一面，有着积极与“新学”接轨的面向。确如其所言，保守与创新并非截然相反的两面，有时同一事物往往蕴含着相辅相成的不同面向。还有研究聚焦于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乡土志，这是一种有别于乡镇志和其他府州县志的独特史书，研究者发掘了其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乡土志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编纂的用于乡村史地知识教育的教材，有着培养学生爱国爱乡思想，倡导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兴办教育、改良民俗、普及科学知识的多重目的，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及地域特色，因而可谓开中国近现代乡土教学的先河。学者从文献价值角度出发，为我们展示了乡土志在编纂体例、编纂思想、编纂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创新之处。

与将天府文化视为相对独立的文化体不同，有学者更加关注其文化内部的差异。如成都的东山地区，尤其是聚居其间的客家人群，这一人群所体现的既不同于移民原籍地文化，又不同于移民定居地文化的独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创新型文化。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出发，学者深刻剖析了这一文化形态的产生过程，指出了其作为应对“移徙时代”带来的挑战所具有的独特学术支撑和历史借鉴意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府文化的孕育与发扬离不开其依托的生态大环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包含了四篇文章，分别是谢桃坊《成都为历史文化名城应有之建设》，孙哲《留存天府文化记忆，挖掘成都文化资源，延伸成都产业链再生——新时代的天府文化记忆工程思考》，魏红珊《天府文化地理研究——以抗战文化为中心考察》，以及李军《新时期天府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基于川西林盘可持续发展的思考》。从这四篇文章的题目不难看出，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于天府文化背后的生态环境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系。如其中一篇论文在历史长河中截取了在传统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农耕文化作为关注的焦点，从四川林盘出发，充分挖掘了天府农耕文化的思想内涵、文化特色以及产业基础，指出了进一步发展与弘扬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当下社会发展中重要意义。

从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角度出发，学者主张对成都政治、教育、文化、城市景观等方面代表性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因为作为中国十大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都，需要重要的标志性历史文化遗存来印证其作为古都和历史城市的事。由于许多著名的历史文化遗址随着时代变迁而遭受毁坏甚至消失，这一保护的迫切性显得尤为突出。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加强对成都历史文化遗址的恢复和保护工作。学者们还对天府文化记忆工程进行了重点研究，文化保护与文化再生其实是同等重要的议题。尽管经历了历史长河的洗礼，但成都有着辉煌，也有苦难，但总是能够再生和繁荣，其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城市的文化包含着深厚的底蕴，具有朝气与活



力。这种底蕴、朝气与活力需要学者和社会共同努力，以在新文化领域中继续“创新创造”。

也有论文将关注的历史时段由数千年的历史长河，缩短至近代抗战时期的四川天府文化，以抗战文化作为考察的中心。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四川承担着全面抗战的重要责任，并且有效实现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结构的重新组建，因而具有重大意义。论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抗战时期天府四川文化地理面貌，尤其是其中体现的互动包容与创新创造进行了细致考察，发现其中不但蕴含着平、津、沪、宁的先进文化，也有欧风美雨的外来文化。传统与现代、精英与民间、本土与外来、传承与创新等等面向共同构筑起了多元协调发展的文化生态，这样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内涵丰富、角度多元的天府文化地理图景。

本书最后一个部分是讨论天府文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包括谭继和《丝绸摇篮与天府文化》，祁和晖《开辟丝绸之路的两位“华阳国”奇男子——蜀郡司马相如与汉中郡张骞事略》，王苹、冯婵、柳京廷《“天府文化”与域外世界的交流交往研究》，刘兴全、郎玉屏《李冰治水的创新与天府文化的养成》，彭邦本《都江堰：天府水文明的世界丰碑》，周桂钿《弘扬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以及白井顺《一衣带水论天府之国——中日文化交流考略》。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讲，作为蕴含丰富物质创造与精神内涵的文化系统，天府文化对人类社会同样做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这些学者认为天府文化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外部文化和世界有着深刻的联系的。天府文化虽然生根于成都平原，是一种地域文化，但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进行着交流、荟萃乃至转化，因而是各式各类文化的总称，是复合性概念，是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的地域文化。

天府文化同外部文化的联系体现在丝绸的生产和运销上。作为中华丝绸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摇篮之一，成都平原是连接诸条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枢纽。汉唐以来的大量蜀锦、蜀绣、蜀布、漆器、邛竹杖及其他特色商品的出产与运销，使得四川天府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独放异彩，也使得天府文化得以孕育出开辟丝绸之路的著名人物诸如蜀郡司马相如与汉中郡张骞。天府文化孕育的重要历史人物还有不少，其中具体到李冰治水这一天府文化的重要源头而言，其

创新精神不但培育了天府文化的创新基因，其治水创新技术同样丰富与提升了天府文化的科技含量与高度，而治水的创新成就则孕育了天府文化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治水的创新促进了天府文化优雅闲适文化性格的养成。

另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天府文化中的文学艺术甚至曾对邻邦日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学界便长期存在着“入蜀”的渴望，也确实出现了他们亲身体验“入蜀”的记录。虽然这些日本人有着迥异的目的和立场，但汉诗的内容是其内心世界中共同的联结。访问巴蜀的日本人与帮助蜀客的日本人也作为巴蜀的居住者亲身参与了巴蜀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总的说来，《天府文化研究》（创新创造卷）共收录“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天府文化的物质创造”“天府文化的精神建构”“天府文化的生态创新”，以及“天府文化的人类贡献”这五个视角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主题，共计 28 篇研究论文，可以说涵盖了天府文化的主要面向和丰富内涵，极大地推动了天府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学术研究没有止境，但这一卷文集的出版无疑为天府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一步。相信随着关心和从事天府文化研究的众多学人的不断努力，以及更多有关天府文化的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未来的天府文化研究必定会是大有可为的。

2017 年 11 月 12 日



序 言 王 笛 001

天府文化“创新创造”之源流

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 | | | |
|----------------------------|---------|-----|
| ——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 | 舒大刚 | 003 |
| 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的活水之源 | 谭 平 | 016 |
| 天府文化特色刍议 | 何一民 | 031 |
| 天府文化的源流、特质及其相关概念探析 | 潘殊闲 | 050 |
| 天府成都古今“创新创造”名人的情感与智慧 | 王 川 吴其付 | 063 |
| 兼容：天府文化的特质及其由来 | | |
| ——兼论成都在汉藏交流中的连接、枢纽作用 | 石 硕 奚玲玲 | 075 |

天府文化的物质创造

- | | | |
|-------------------------|-----|-----|
| 天府之国辉煌都市酒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 陈 剑 | 089 |
| 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说天府文化 | 黄剑华 | 139 |



论秦汉治蜀的两大伟绩

——泽惠万代的都江堰与广都盐井 张学君 173

天府之国的兴衰与文化变迁

——以成都与西安为例 谢元鲁 188

壮丽以示威仪

——明蜀王府建筑群的文化内涵 胡开全 203

天府文化的精神建构

位卑未敢忘忧国

——陆游的蜀中山水之意 尹 波 221

“不欲于卖花担上看桃李，须树头枝底方见活精神”

——宋代大儒魏了翁回归元典的创新品格 粟品孝 228

论四川国学院的创新性及其意义 魏红翎 233

试论晚清民国时期巴蜀乡土志的编纂及其创新 李勇先 246

天府成都东山地区客家文化的创新演化过程 陈世松 268

晚唐天府说成都 邓经武 279

天府文化的生态创新

成都为历史文化名城应有之建设 谢桃坊 295

留存天府文化记忆，挖掘成都文化资源，延伸成都产业链再生

——新时代的天府文化记忆工程思考 孙 哲 303

天府文化地理研究

——以抗战文化为中心考察 魏红珊 309

新时期天府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基于川西林盘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李 军 333

天府文化的人类贡献

丝绸摇篮与天府文化	谭继和	347
开辟丝绸之路的两位“华阳国”奇男子		
——蜀郡司马相如与汉中郡张骞事略	祁和晖	355
“天府文化”与域外世界的交流交往研究	王 莘 冯 婵 柳京廷	369
李冰治水的创新与天府文化的养成	刘兴全 郎玉屏	381
都江堰：天府水文明的世界丰碑	彭邦本	394
弘扬民族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周桂钿	404
一衣带水论天府之国		
——中日文化交流考略	白井顺 著 申绪璐 译	415
后 记		430



天府文化 “创新创造”之源流

传承巴蜀文明 发展天府文化

THE RESEARCH
OF TIANFU CULTURE

“创新创造”之源流旨在探讨天府文化“创新创造”精神的历史渊源、本质内涵、时代特征、宏伟蓝图等。“创新创造”是成都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它源自成都平原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是华夏文化、巴蜀文明的结晶，是自然与人文、封闭与开放、农耕与城市、原生与外来等多种元素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此种精神的支撑下，成都产生了众多领先世界、擅美中国的伟大工程，涌现了一大批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古今名人。如今，成都着力建设充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天府文化的“创新创造”精神亦是展现成都历史文脉、城市品位和发展愿景，增强成都文化自信，夯实成都文化软实力，提升成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精研“天府文化”，重建精神家园

——天府文化的历史与演变

舒大刚①

摘要：以秦统一巴蜀、李冰治水、文翁治蜀、西学东渐和文化自觉等为推动力，天府文化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第一期“前天府文化”，时限为秦统一前，在文化上是相对独立、创造发展、多原创性成果，如三才皇、五色帝、阴阳、五行、巴蜀图语等；第二期“中天府文化”，时限是汉至清，在文化上是融入统一、继承创新，重要成就有“七经”“十三经”“汉赋”“史学”“古文”“宋词”“术数”“宗教”等等；第三期“后天府文化”，时间是辛亥革命至“改革开放”，在文化上是锐意改革、中西兼用，重要成果是“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疑古思潮”“社会改良”等等；第四期是“新天府文化”，时间上是“十八大”以来，在文化上重在自觉自信、传承重建，包括信仰重建、道德重建、礼仪重建、话语重建和经典重建等等。

关键词：天府文化；阴阳；三才；五行；蜀学

“天府”一词，或指天王之太府，或指天上之房星，或指优越之地域，都是优雅、高尚、富贵、和谐的象征。这里讨论的天府，当然是地域和文化称

① 舒大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谓，也是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文化体验。地域的“天府”，指地理优越、特产丰富、人文发达的区域，如关中（苏秦、娄敬、张良）、燕赵（苏秦、耿弇）、成都（扬雄、诸葛亮、法正），都曾经获得“天府”称谓。但是由于环境变迁、人世嬗替，目前能称得上“天府”的就只有成都平原了（至于新评出的所谓“天府之国”，还得经过历史检验后再做结论）。

《华阳国志·蜀志》载，李冰既治水行舟，“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记》疑即后文“横有为《蜀传》”之《传》，古者传、记相通，是对经典以外重要文献的概称。扬雄、谯周等人俱曾作《蜀王本纪》或《蜀纪》，董说《七国考》“李冰渠”引：“扬雄云：‘蜀有李冰渠，秦蜀守通。’”下即引《华阳国志》本文，说明此处的《记》也许就是扬雄的《蜀王本纪》，其中曾记载有李冰治水作堰及其所达效果的历史事实，扬雄又是成都人，他对物华天宝的成都必有深刻认识，因此称成都为“天府”或许就始于扬雄《蜀王本纪》。

天府文化，既是历史上天府之国文化的总括，也是今天成都市域文化的特称。即使在特指的成都市域文化中，天府文化似乎还可以分出若干段落，如前天府文化、中天府文化、后天府文化、新天府文化等等。前天府文化，指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前，在成都地区独立孕育和发展的文化，或称古蜀文化；中天府文化，指秦置蜀郡，李冰治水，特别是汉初文翁化蜀后，才出现的“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经济繁盛、人文发达的景象，斯时的天府文化，与国一体而又自具特色。后天府文化，指近代工业革命，特别是西学进入成都后，产生出既与历史紧密联系，又有很大背离和更新的文化。前三个阶段，其文化特征既具有连贯性，也具有阶段性；后一个阶段的天府文化，有继承也应当有发展。新天府文化，则是我们当下要着力建设的当代文化。之所以称先秦时期为前天府文化，是因为彼时“天府”并不指成都，而是指关中和燕赵，当时成都在文献中或被称为“都广之野”（《山海经》），或被称为“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战国策·秦策》）。其自然条件虽好，“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山海经》），具有成为天府的自然基础；但是当时还是靠天吃饭，人对于自然力的控制很差，没有主动权，所以我称其为“前天